

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典范

□ 储 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强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要求全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等思想，旗帜鲜明地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定立场，同时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崭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并以此为指导，面向时代课题，在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认识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

展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共同体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史。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延伸，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

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式，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梳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提出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这三个具有不同本质和类型的共同体概念。“真正的共同体”是对“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中立、对“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的批判而提出的人类理想，是人类在发展进程中追求的终极目标。这种“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也即“自由人联合体”。

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

展理论，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给予完善和发展，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的联合体”，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性。从一定意义上讲，致力于世界各国双赢、多赢、共赢的目标，积极倡导联合、合作、普惠、共享价值观的“人类命

核心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运共同体”，正是马克思一生追求的“真正的共同体”所蕴含的价值在当代世界的表现或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过程中需要经历的阶段：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消除共同体的异化，走向“真正的共同体”。

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坚持和发展

自从国家出现以来，如何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始终是每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及其治理进行了深刻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的一般原理，核心体现在关于国家及国家治理的本质、国家治理的目标、国家治理的组织原则、国家治理的根本方法、国家治理的政策和策略、国家治理的领导权以及国家治理的改革及发展途径等重大问题的论述上。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抉择。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在习近平看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的

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独创性贡献。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将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将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强调人民协商共治，坚持党的领导与基层自治相结合，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将国家治理、政党治理与全球治理一体推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改造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活动和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制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策略，科学阐述了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确立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为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列宁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与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列宁建党理论，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建立的党。它同别的政党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具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自觉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则，在实践创造上，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直击积弊、扶正祛邪；在理论创新上，提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体系”的重大命题，围绕全面从严治党

“为什么治、谁来治、怎么治”，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党的建设鲜明主题，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遵循。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经典著作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辩证与实践的自然观为基本认识，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幅人、自然、社会相和谐的美好蓝图，为生态文明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也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指明了理论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就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凝聚形成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他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科学揭示生态兴衰决定文明兴衰的发展规律；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从哲学层面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内在关系，为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理论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从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系统论述、提出明确要求。在这些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又将绿色发展理念作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倡导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基本方略，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总体要求，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态文明观。这一生态文明观是我们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最新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与时俱进。

理论研究



政绩与政德是紧密联系的。政绩是政德的社会实践和客观体现，政德是政绩的道义评价和价值目标。领导干部的政绩离不开政德的保障和支撑，脱离政德讲政绩，就有可能背离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容易滋生一些劳民伤财的“学费工程”、有始无终的“烂尾工程”、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同样，领导干部的政德也离不开政绩的体现与表达，脱离了政绩讲政德，就会成为流于形式的空洞说教，容易出现一些冠冕堂皇的“纸面道德”、坐而论道的“表面文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领导干部避免出现这些问题，必须始终把政绩与政德统一起来，既追求符合政德的政绩，又修炼彰显政绩的政德。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领导干部往往重政绩、轻政德，使得二者不能很好的相统一。在他们看来，政绩是“硬指标”，为官一任，政绩显赫，提拔有望，群众看得见，还能留个好名声。而政德是“软指标”，考评不好量化，群众不太计较，政绩突出自然“俊遮百丑”，政德上只要不出大的问题就行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也是十分有害的。重政绩、轻政德会滋生“政绩冲动”，导致“政德出轨”，进而引发“蝴蝶效应”，带来严重后果。这于党于国、于人已有害而无一益，必须坚决反对，始终把政德放在首位。

重绩又重德、选贤任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方得“旷世奇才”诸葛亮，继而“三分天下有其一”。在这选与被选中，既有刘备的“德”，也有诸葛亮的“能”。求贤之道，古今一理。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历来是既重视考绩又重视考德。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选用和考核干部的标准，主要看其能否言行一致地坚决拥护党的纲领、执行党的路线、完成党的任务。这也是综合考量干部政绩与政德的问题，考绩考察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效果，考德考察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态度。用人导向最重要、最根本，也最常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好干部标准，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褒奖和重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不提拔“清茶报纸二腿郎，闲聊旁观混光阴”之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公认和称赞。

历史和实践证明，从政者“常修为政之德”，才可能有突出而巩固的政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官先做人，从政德为先”。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政去

要讲政绩更要讲政德

□ 欧阳辉

人声后，民意闲谈中”。革命烈士方志敏“官”很大，却身无分文、一生清贫，让国民党军队的高官感到无法理解。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生简朴，从不公私私用。他的女儿中学毕业后，跟其他人一样被安排到食品厂腌咸菜。像方志敏、焦裕禄等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一直是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他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将流芳万代。

政绩事关民生福祉，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功成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而是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这充分诠释了树立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所在。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离不开高尚的政德观。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干部是为自己的“官帽”干活，还是为人民的“腰包”干事，绝对逃不脱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领导干部只有常修个人之“德”，自觉摆正个人政绩与党的事业、自己升迁与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多作贡献，才能取得无愧于新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政绩。

1842年10月，拿到博士学位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之后，马克思才终于找到了工作。很遗憾，这份工作不是什么波恩大学哲学系教师，而是科隆的《莱茵报》编辑。在马克思刚刚从事编辑工作时，心情并不愉快，因为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他遭遇了太多的变故和波折。

马克思拿到博士学位时，还没来得及把证书在怀里揣热乎，就遭到了来自普鲁士政府和波恩大学全体教师发出的巨大压力——他们解除了鲍威尔的教师职务，当年正是在鲍威尔的鼓励之下马克思完成了博士论文。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完全没有发表和出版的可能，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都不知道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长什么样。

在此期间他收到了导师鲍威尔的来信，希望两人能一起办一张激进的报纸。马克思非常欣喜，但是好景不长，普鲁士的新国王颁布了一道书报检查令，这个办报纸的愿望胎死腹中。不过，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愿望在马克思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根来，他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家言论自由、针砭时弊的报社——《莱茵报》。他文思泉涌，妙笔生花，为《莱茵报》撰写了许多政论文章，《莱茵报》也注意到了这个才能不凡的小伙子，在发表了马克思文章的同时，邀请他来《莱茵报》工作。于是在参加完姐姐的婚礼之后，马克思即刻动身前往科隆。

报人马克思的“苦恼”

□ 王 强

科隆是德国西部著名的城市之一，当地以科隆大教堂而闻名于世。马克思在这里谋得了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报社记者和编辑。起初只是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但随之马克思发现了意外之喜。这份意外之喜就是通过关注和研究莱茵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可以观察到一个真实的德国社会。马克思心心念念的愿望，就是研究、批判和改造德国现实社会。

我们时常把大学称作“象牙塔”，而毕业和就业的过程，是从象牙塔里出来进入社会的过程，社会会把全部生活的复杂性摊给你看。马克思初入社会时就大胆地挥舞起了笔杆子，用辛辣讽刺的语调针砭时弊，特别是将在学校里学到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同时，他开始接触到农民、贫困者的生活状况问题。马克思发现，他学到的整个知识体系在现实问题面前都受到了根本的动摇，他先前没遇到过真正的贫困问题。那么，到底是马克思的知识对，还是社会现

实问题对呢？马克思苦苦思索着答案。后来马克思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时，把它叫作“《莱茵报》时期的苦恼”，这个“苦恼”至关重要，它决定性地使马克思脱离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而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越走越近。那么，马克思究竟在“苦恼”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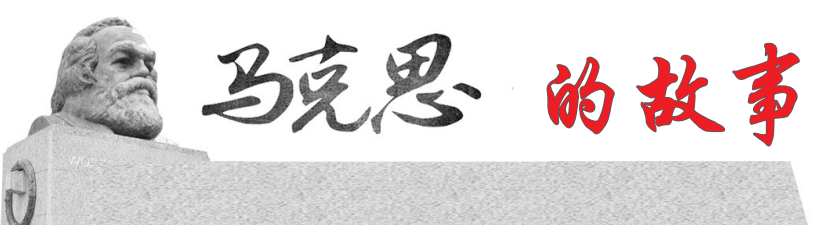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19世纪初，德国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中一个主要形式，就是把原先由农民共同使用的森林、草地等公共资源进行大规模私有化，这一进程遭到了农民的强烈反对。马克思关注的问题，缘起于《林木盗窃法案》的出台。莱茵省摩塞尔河谷植被茂密、风景如画，这里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几百年来许多农民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这里冬天气温寒冷，因此农民便在森林里捡拾枯枝，带回家生火取暖，偶尔也用斧子砍伐树木。这种生活方式延续了几百年，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最近新兴的资产阶级群体把森林占为己

有，甚至出台了物权保护法，法律声称：农民一切砍伐林木的行为都侵害林木所有者的利益，都是“盗窃”行为，应当以盗窃罪论处，甚至拾捡枯枝的行为也是“盗窃”，以同等罪名论处。农民不高兴了：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森林属于自然资源，为什么到了今天反而变成了少部分人的私有财产，而大部分人日常赖以维生的行为却变成了“犯法”呢？太荒唐了！马克思看完了议会辩论记录后，立即决定为农民和贫苦者辩护。

我们知道，马克思大学期间先后学习过法律和哲学专业，是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入手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国家和法律是“理性”的代表，它理应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但现实却是一小部分权贵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甚至还要立法来惩罚农民，而法律却恰恰站在了私人利益这一边。马克思不得不深入思考：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是法律出了问题，还是立法者出了问题？马克思立刻敏锐

地意识到，两方面都出了问题，但最为根本的方面是哲学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德国社会就依然不能进步。

同时，马克思还关注犹太人呼吁的“宗教解放”运动。普鲁士政府要求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引起了犹太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实现宗教信仰自由。但是，马克思提出了疑问，宗教信仰自由能够仅仅在宗教领域实现吗？不能，因为这不仅



它实现的是犹太人的“犹太精神”，而这正是横行欧洲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出“唯利是图”的特征。只要这种精神存在，人们就是自私自利的人，就会有资本家压迫工人，就会有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因此，政治解放只不过是作为资本家代言人的统治者的解放，而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是全人类的解放，它远远高于“宗教解放”，也同样高于“政治解放”。

那么，如何实现人类解放呢？马克思说：“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意思是说，唯有让无产阶级掌握哲学武器，才能具有革命和解放的觉悟。马克思把他的想法写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篇是《论犹太人问题》，后来发表在《德法年鉴》的创刊号上。这两篇文章共同的落脚点，就是“人类解放”的主题，这是马克思的“初心”，也同样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人类解放”像一颗火种，深深地种在了马克思的思想土壤里。马克思一生的事业，都在为实现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